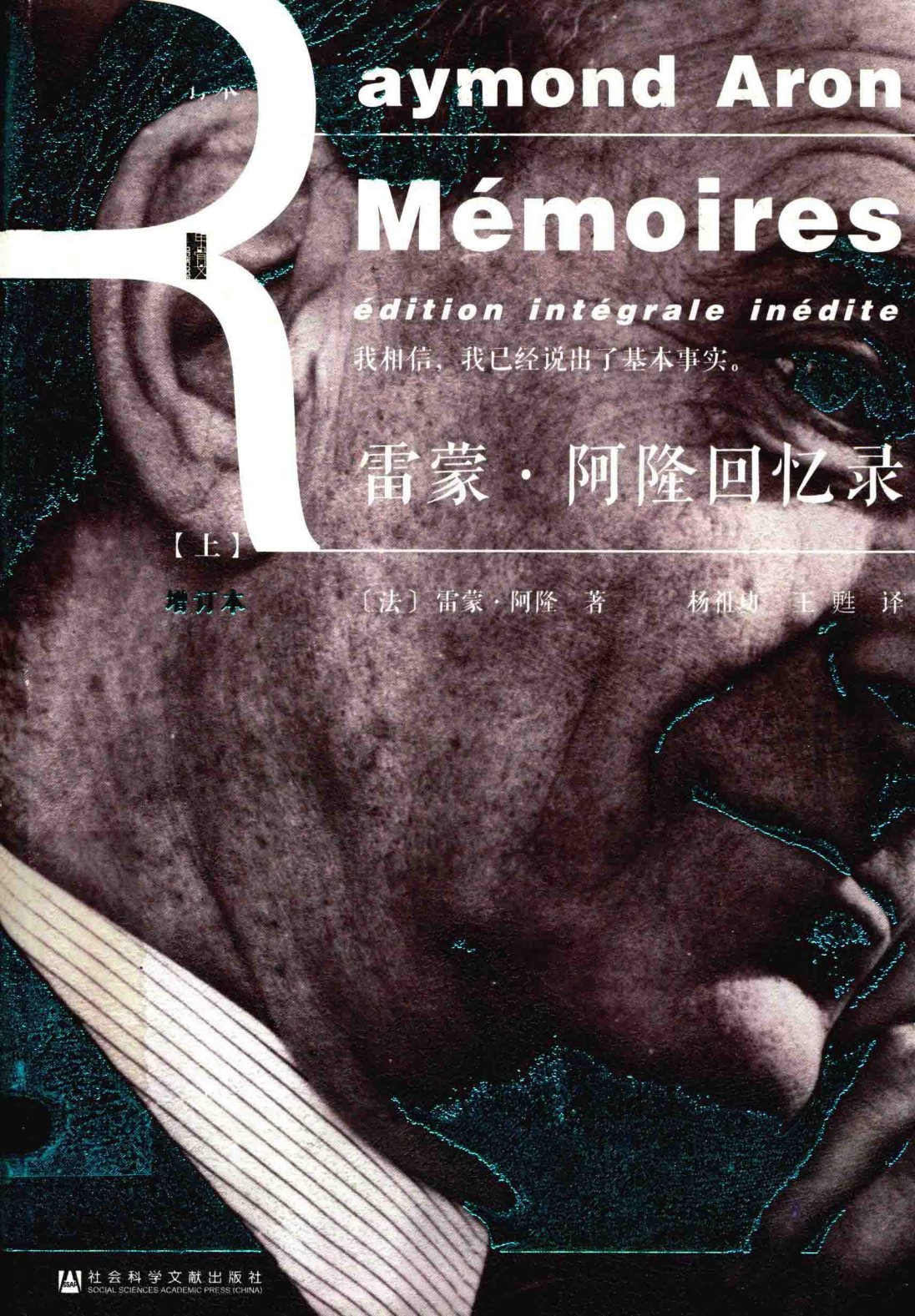




Raymond Aron

Mémoires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上】

增订本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 魁 译

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简体中文版于1992年首次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两个版本依据的都是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删掉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这三章。Robert Laffont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增订本”，收录了初版中删去的三章。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正是对应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订本”。中文版“增订本”由杨祖功先生对原译文做了文字上的修订完善，王甦女士翻译了新收录的三章内容。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回忆录有助于读者理解偏重现实主义的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质及生活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也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并不认同书中的有关论断，但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阿隆的思想，我们对于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 的时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与 20 世纪历史相交织。他 1
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905 年，卒于 1983 年，这一年，以
“欧洲导弹危机”为终极标志的冷战正愈演愈烈，六年后，苏联
帝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垮台。阿隆在 1930 年确定思考计划时
所依赖的基础是他对尼采预言的“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大型战
争”时代的种种理解。当时的他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魏玛
共和国的没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他也从未偏离过这
一思考计划：“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思考 20 世纪，并尝试阐
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
制、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①

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 1989 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
录》依然是对 20 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在这本书中，阿隆不
但对自己作为学者进行了分析——为了以哲学、历史、社会
学和战略的观点进行交叉分析，他从学科间传统藩篱中解放
了出来——而且还对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战士的介入参与，进
行了批判性评价和严格慎独的双重把关。民族和帝国之间、
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一页页书稿编织而出。第一次

* Nicolas Baverez，法国当代史学家、经济评论员。——编者注

① Raymond 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 Paris, Julliard, 1981, pp. 299 - 300.

2 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欧洲的文明的自我毁灭，大战让思想真空的豁口大开，各种关于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纷纷乘虚涌入，而这些意识形态又都将内战和对外战争当成统治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倒闭、失业、赤字和债务而来的大型经济危机，自由国家的根基被动摇。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预先写就或早已确定了的；是人民在决定历史。最后迎来的会是暴力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们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战争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 1989 年天鹅绒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后依然是民主战胜了帝国和极权制。

但是，《回忆录》是否会因此而只属于过去呢？它揭示的是否仅仅是一个时期的真相以及一个已然过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他十分独特且具有重大影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试图以最为实际的方式阐明历史诞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指出，21 世纪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与阿隆那本遗作——《本世纪的最后这些年》^① 描述的情景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阿隆讨论了苏维埃主义的 future 和民族主权的位置，并以此得出了国际体系中两极世界具有稳定性和国家至上的结论。

苏维埃帝国在 1989 年崩塌；民主制虽不再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依然因为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在与大规模恐怖主义的联合中重新复兴而受到威胁。世俗宗教的瓦解让修会宗教和政治神学恢复了地位。随着以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为

^① Raymond Aron,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 Paris, Julliard, 1984.

开端的一连串冲突的发生，昔日的冷战重新演变成热战。一个传统维度和多个不对称的方面交织于这些冲突中，而且冲突还侵入了诸如太空或网络空间这些新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运载工具的扩散，核威慑已经被架空。在服务和新技术的发展面前，在不同领土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面前，工业社会日益消失。在那场差点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崩溃的大危机来临之前，全球化通过让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脱钩，就已经将一种普世维度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化首先导致的是经济调控方式的一次新转变，公共干预的强力回归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变化还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 20 世纪后半叶由美国、欧洲、日本组织并稳定世界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 世纪呈现为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在这个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与阿隆毕生研究的那种 20 世纪的刚硬且稳定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然而，这一表象并非事实。阿隆为了成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分析家和阐释者，一向坚决拒绝决定论，也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历史的终点。自 1960 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历着相同的唯一历史的人类社会的诞生^①——为主题的讲座中勾画了我们时代的原则。确切而言，全球化建

① Raymond Aron, « L'Aub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 conférence donnée à Londres le 18 février 1960 sous l'égide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Université hébraïque de Jérusalem et publiée dans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Paris, Plon, 1961, pp. 260-295.

立有一种紧张关系上，一边是市场统一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社会的崛起，另一边则是身份诉求的加剧和暴力的激进化。正是这种对人类自由、历史消逝和认知局限的强烈意识，让阿隆的思想在 21 世纪的冲突与危机面前反倒具有了现代性。如果想从他的《回忆录》中找出一种学说、一个预言或一个被揭示的真相，那只会是徒劳无功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一种公民的情操，这让我们得以理解那些让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让我们选择投入自由事业之中。同样，如果把《回忆录》当成一部叙述民主如何战胜极权主义且让自身得以存续的教材来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与此正相反，它给我们上了一堂自由主义应用课，展现了在各种危机、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编织人类历史纷乱经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是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战争和革命的。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这是阿隆喜欢引用的汤因比的说法，它提醒我们，历史既非线性的也不具有连续性。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动力——民主运动、资本主义、民族和帝国、战争——都不具备永恒不变的要素。它们都是历史现象，是变化不息的。对这些历史的转向时刻加以解释并从中得出教益，这极其重要，却也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势力等级的改变，它们也是在对各种价值、思考模式和人类生活的管理制度重新提出质疑。

阿隆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符

合他曾在《历史哲学导论》^①这篇论文中探索研究过的人类历史命运——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曾强调，正是这篇论文将历史哲学引入了法国哲学史中。这也解释了为何阿隆会对20世纪节奏性发生的大动荡有超前而且准确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隆还是一名少年。当时的他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但在德国逗留时，他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明白了纳粹主义的性质及其危险，从而成了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莱维（Elie Halévy）一边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后半期，他就开始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做比较。1939年，他响应号召到伦敦，并于1940年6月加入了自由法国。从1945年起，他阐述了必然导致世界两极化的苏联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性质，随后又分析了冷战——其所有内容都可以表 5
达为“无法实现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战争”——并像教师一样为世人讲解了核威慑带来的战略革命。^②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这让阿隆成了第一批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③而且他在反抗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方面的积极努力没有妨碍他分析斯大林去世后苏维埃政体的演变，也没有妨碍他设想作为后冷战世界关键事件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最后，他还在经济方面捍卫了战后市场经济——从管制封闭的生产体系的重新开放到共同市场的建设，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进。

①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les limites de l'objectivité historique*,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s idées», 1938.

② Raymond Aron, *Le Grand Schisme*, Paris, Gallimard, 1948; Id., *Les Guerres en chaîne*, Paris, Gallimard, 1951.

③ Raymond Aron,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 Paris, Plon, 1957.

毫无疑问，自雷蒙·阿隆辞世以来，历史加速发展，出人意料的事件层出不穷。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苏维埃帝国意想不到的骤然倾覆，而且这一切还是在和平情况下发生的。拆除柏林墙并非一个军事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和精神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产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而是因为被东方势力奴役的人民发动了起义，他们一方面反抗谎言和恐怖的联手，另一方面还反抗着变得无法自我革新、只能靠武力维持统治的腐朽的苏维埃体系。而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则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使宗教被重新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还为新一轮的尚武好战打响了起跑枪。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制造出泡沫和破产，直到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差点儿导致了一场范围和强度都超过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货紧缩。

全球化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这关键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苏联入侵，约翰·保罗二世
6 当选教皇，这两个事件会对将来苏联解体起关键作用；邓小平发起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穆斯林觉醒且导致了神权政治复兴的伊朗革命发生了；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也在这一年推动货币政策的转向；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成为首相，她为一种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调控标准开辟了道路。影响并塑造21世纪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现出端倪：一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二为民族主义及在种族或宗教上的认同感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报复，三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只是即便到了苏联解体时，这些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识层面上被

理解，也未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关注。

人们曾提出过对冷战之后的世界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乌托邦，它是一种与市场民主的全球崛起相连的历史结局，却在双子塔的废墟中化为了灰烬。另一种是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同亚洲专制政权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明冲突。事实证明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过鉴于亨廷顿的观点有助于让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条歧路合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更加危险。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让美国势力在战略和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级大国的假定所衍生的战略泡沫的破灭便是例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陷入了困境。认为银行和市场理应自我监管，这让房地产和信贷产生了经济泡沫，这类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证。

与1945年发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后便仅满足于发放和平的虚假红利，并对世界和资本主义放任自流，且不再试图为21世纪设想原则、制度和规则。这是一种对冷战后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思考和构建的双重失败，2000年以来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冲突都直接源于这种失败。那些关于历史终极样貌的梦想，不论它们是以市场民主还是以欧洲式的永久和平为标志，不论它们是以新保守主义的过度滋长还是以对两极性加以延续的其他方式——诸如反恐战争或反对邪恶轴心的战争——为标志，都同样源自对全球化时代的不理解。

雷蒙·阿隆的思想遗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的这种巨大转变。历史决定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否定了人的自

由：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它完全取决于人，人既能够不断推动历史，使之朝向同属一个人类，甚至同属一个星球的归属感方向发展，又或让暴力在获得科技帮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时向极端升级。基于同样的原因，简单的想法——尽管它们的诱人之处也是它们的力量所在——会经常显露出错误和危险来：无论是力求和解的模式还是撒旦模式，无论是悲观模式还是乐观模式，一旦考虑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过渡时期所具有的复杂性、消解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模式就会统统失败。最后还有一点，出现于历史断裂时期的新问题是不能用过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决办法加以思考和对待的。简言之，21 世纪的人必须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独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其中谋划行动，而不能将 20 世纪的甚至 19 世纪的种种类型或战略运用到全球化进程中。

美国已经无法再单独预见或操纵多极世界的风险与压力，中国抑或软弱无力的联合国多边主义也同样无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残酷的新例证。同样，以前还可以用欧文·费雪在 1933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6 年建立的原则——通过拯救银行、以公共开支来维持经济活力和支持就业、控制保护主义的影响力——来对抗通货紧缩和阻止经济衰退，但世界资本主义在走出危机这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却已无法运用这些原则来解决了。如何协调依然属于各国自身权限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化？如何调节金融领域、稳定
8 汇率市场并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减少商业、金融业和货币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如何让合适的全球性风险的治理方式浮出水面——不论这些风险是金融的还是工业的，是环境的还是气候的，抑或鉴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和网络世界的

扩大而是地缘政治的？既然就调控和监督而言，拥有特别强大的专制势力的发展中国家让资本主义从政治自由和开放竞争中解脱出来，那么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应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挑战？

全球化的辩证逻辑

21 世纪的开端是以世界局势和民主状况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试图将阿隆为了理解冷战两极秩序及工业社会而构建的概念类别应用到这一全新环境的做法是无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宁也非希特勒；即便只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宗教性质和其源自西方之外这两点加以考虑，也能明白宗教激进主义是不能与 20 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混同的；与处于美苏关系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与非殖民化引起的冲突有着更多相似点；处于开放经济核心的系统性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与凯恩斯的增长机制正好相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一起上升，增值价值的分配方案不利于资本增长——这让利润和投资也受到了阻滞。

阿隆用以分析 20 世纪历史的那种概念和思想脉络受到了启蒙思想和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公民化国家支配一国的内部生活，而丛林体系则超越国家继续支配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就是以二者的区分为基础的；国家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面对外部危险时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存在某种三元结构，纵横交织其中的三元分别是：国际体系——民主制和极权制之间、民族和帝国之间的殊死斗争支配着它；国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载体，各国之间为了自身势力的增长而相互对抗；社会——它受到了工业社会自身紧张关 9

系及参与者从政治权威下日渐解放这一事实的影响。民族国家自 17 世纪以来就作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发展出了民主公民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联系等要素，在这一格局中，民族国家成为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内涵的关键因素。20 世纪是西方自 17 世纪就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的延伸。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民主制的畸枝，世界冲突则是由支配力扩张至全球规模的西方所开展的内战的畸枝。

全球化标志着与具有这种政治思想的世界的根本决裂。随着法外之地和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灰色地带的倍增，随着移民流控制中种种困难的出现，各种原始形态又重新进入各国内部，连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国际公民身份的萌芽迹象也大大增加。就区域层次而言，欧盟便是例证，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市场和自由而非以武力、征服和支配为基础达成的一个大陆的一体化。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化政治治理的孕育便是例证，从二十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到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再到关于气候的艰难协商，都是其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各个国家受到了位于自己实力之上及之下的其他国家的挤压，已经无法再在行使合法暴力和操控国家关系上实施垄断；一种以社会信息网为基础的全球性公共舆论也间或被调动，伊朗人对抗毛拉政权的暴动便是例证。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将发展放在绝对优先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追赶——正如人们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指出的，这些国家为了发展甚至不惜损害环境——加之经济和金融危机已让西方在资本主义调控的合法性上破产，西方因此失去了平衡。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它的这种强大不是一

种绝对的强大，而是相对的；欧洲则因为各国对货币、预算、税收、社会和环境的各种规定形成了敌视生产和革新的环境，而被困于经济增长低迷和大规模失业的境遇中；日本因为 20 年的通货紧缩而无法前进，已经不再是世界第二大国，它在亚洲反倒受了新兴势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赶超和在政治上的排挤。

全球化危机让世界资本主义向东方和南方加速倾斜。自此，新兴世界占据了工业生产的 52%，而不再是 20 年前的 30%，它还持有 80% 的世界外汇储备。亚洲创造了世界财富的 21%，并拥有 32% 的世界资本，而美国和欧洲所占比例分别才到 30% 和 20%。与 19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相反，现在是欧洲集中承受了 2008 年信贷崩溃带来的压力。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反映的是一个大陆的衰落及为其一体化所掩盖的适应全球化新局面上的失败。欧洲大陆的人口持续减少，据预测，从现在到 2050 年欧洲人口还会减少五千多万；这也是一个过度负债且缺乏竞争力的大陆，这点体现为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20% 锐减到了 15%，而且自 2000 年起，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从 28% 减少到了 22%。尤为重要是，自希腊危机发生后，欧洲显露了它在处理内外打击上的无能，这与美国或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卓有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金融和货币上的各种压力并没有强化欧盟的制度，也没有迫使它实现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或是对具有连带性的预算政策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鼓励，因此这些压力不但没有再次促进欧陆的一体化进程，反而导致了各国转向本国战略，普遍采用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连那些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例外——而对这种政策的普遍采用又对欧洲经济复苏构成了严重

威胁。这些问题除了关系到欧元的存续，还对欧洲的独立以及欧洲在 21 世纪世界中的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柏林墙的倒塌摧毁了东西藩篱，全球化取消了南北藩篱，但也消解了美国和欧洲因资本主义垄断权而取得的红利。曾主导过世界经济 20 个世纪之久——最近这两个世纪除外——的亚洲强势回归世界舞台，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紧随其后；特别是非洲因其充满活力的人口因素（2050 年将有 18 亿人）、丰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可耕地资源储备）、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带来了每年 6% 的增长的大陆资本主义而成了一个发展的新天地。

与 1990 年代人们抱有的天下无国界的幻想相反，国家远远没有消失，正如我们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强大的战略以及在这些国家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中见到的一样。不过，21 世纪的格局由于更多参与者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明显愈加复杂。当今国家体系是多极的，其中不光混杂了为了争夺领导权而相互对立的两个超级势力——美国和中国，还包括了各个次级极点——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欧洲和南非（如果它能够成功逃脱与津巴布韦相似的变故的话），那些拒绝服从国际社会的国家——比如伊朗、委内瑞拉或朝鲜，最后还有一些向外输出暴力的危机横行之地——从近东途经巴尔干或高加索，直到巴基斯坦。一些新的全球化参与者也与国家一起存在于国际活动领域中：全球化企业、市场运营商、非政府组织、各种活动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团体。在某些领域中，比如人权领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或环境保护领域中，国家不但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压力，而且承受着不定时被调动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家还越发经常地处于与个体参与者的竞争中，尤其是

在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权的争夺中。

在 21 世纪，被阿隆置于现代社会核心部位的三个辩证逻辑——平等、社会化和普遍性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全球化——阿隆从 1969 年开始使用这一概念^①——已经改变了这些辩证逻辑的利害关系且赋予了它们一种全球维度。在普世史的时代，只剩下位于亚马孙或大西洋的某些民族还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冷社会，而几乎全部人类都已生活在各种热社会中，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这些社会持续变化的节奏。 12

经济发展和平等之间的辩证逻辑也不再是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或交锋来定义的。全球化因为让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且让十多亿人脱离贫困，所以大大缩小了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以及各民族内部，各种不平等也加剧了。法国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特例：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领域的膨胀，发达国家的增值价值分配转向了有利于资本收入、不利于工作收入的方向。此外，在服务型经济及充斥着个人主义的复杂社会中，社会阶层变得模糊不清，各种不平等也发生了转化：基于出身、性别、社会地位和学历的不公正待遇，与财富和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具有了同等重要性。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多处不稳定让就业主力军对可能失去既有社会地位心生忧惧，从而形成了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氛围。新兴国家的超速增长表现出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这一指标水平在中国和俄罗斯都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在各

① Raymond Aron,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Calmann-Lévy, coll. «Liberté de l'esprit», 1969, p. 231.

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状况相似——身份认同的冲突，尤其是宗教身份的冲突，趋于创造出比收入或发展不平等更为严重的隔阂。

13 社会化依然以家庭、教育和工作为基本动力，不过方式已迥然不同。开放社会通过信息的、各种人类学体系的，尤其是种类繁杂的家庭结构的 market 和技术，让直接且即时的关系得以形成。家庭没有遭遇预言中的衰落，相反，它似乎成了亚洲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中，人们在面对失去原有社会地位和遭遇社会排斥的风险时，家庭能提供最好的保护。家庭不但没有被全球化削弱，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正如它也是漫漫生命历程中个人安全和活动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作也远没有消失，它依然是建立社会联系、实现社会融合和获取公民身份的第一媒介。与此相反，结构性失业体现的则是人口或领土整体朝着完全失序的方向转变，社会排挤也因此替代贫困成为发达世界中社会的头等大敌。社会异化不再是不平等工作的后果，而是放任失业的后果。

普遍性的发展动力与全球化有着同样的源头。一面是市场的相互融合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面则是身份认同感的强化和价值观的极端异质性，全球化被这两面左右拉扯着。就经济方面而言，资本主义只受到马尔萨斯递减理论的质疑，即便在它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奢侈理论是由正在老龄化的欧洲富裕国家提出的，在北美和新兴世界中反响微弱。全球化遭受的风险尤其来源于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而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和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在人口老龄化冲击来临之前获得更高生活水平